

毛主席1958年视察许昌

辛 建

1958年8月7日，是我一生中最激动最难忘的一日。这一天，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许昌工作，我作为当时许昌专署公安处副处长亲身参与了警卫事项，并聆听了毛主席的教导。时至今日，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和光辉形象依然历历在目，并鼓舞着我“鞠躬尽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贡献力量。

8月6日夜晚9时，我在地委办公室开会时突然接到公安处秘书打来的电话：“有紧急任务，你和刘肃欣科长赶快到火车站！”我当即同刘科长骑自行车赶到车站。这时，公安处副处长朱干同志已在那里等候。朱告诉我，毛主席要来许昌视察工作，我们执行保卫任务。我一听激动万分，光荣感和责任交注心头。在布置了保卫任务后，我全神贯注地凝视北方，盼望主席的来到。旋即一列绿色的火车徐徐开进许昌车站，这是毛主席乘坐的专列。列车停稳后，候迎主席的许昌地委副书记马金铭等同志被通知在车上接见。马金铭等同志上车后列车立即开出，后停靠在城西20华里的长店路段上。在列车上，陪同主席视察的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向主席介绍了马金铭和王延太的情况后，毛主席说：“地方同志工作辛苦，我来你们这里看看农村形势。”马金铭汇报说：“我们的工作搞得不太好，可到襄城县双庙乡的郝庄村、三里沟乡的后梁庄、十里铺的小张庄看看，几处是一条线，近百里，沿途都是庄稼，这些地方也就代表了许昌地区的农业生产形势。”毛主席说：“很好，明天我们一路同行。”当晚天气晴朗，星光甚明，毛主席在许昌大地度过了一个安眠之夜。

8月7日清晨，晴空万里，阳光灿灿。七点三十一分钟，毛主席一行的几辆吉普车开进了襄城县双庙乡的郝庄村，同来的有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和省委书记吴芝圃、副书记杨蔚屏等领导同志。为了保密，当时对外宣布为“检查团”。主席在村边公路上下车伊始，不顾劳累，便步行去大田地视察。在村东头的地里，我老远就瞧见了走在最前面的是毛泽东主席。他身材高大魁伟，步伐矫健沉稳，头戴草帽，身穿白衬衣和灰色半旧军裤。走近的时候，我见他老人家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当时，我心里十分高兴和激动，便和襄城县委副书记刘熙民同志一步朝前迎上去。毛主席伸手同我们相握，他握得很有力，我感觉出一种特别深厚的感情，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紧紧握住主席的手，原先想好的问候之词全都忘掉了，只是连连说：“主席好，主席好……”刘熙民同志亦然，颗颗热泪从他的两颊滚落。

毛主席态度和蔼，平易近人，我迅即感到可亲可爱，觉着他既是我们的伟大领袖，又是一位亲切的同志。主席问刘熙民的姓名，刘答：“我叫刘熙民。”主席说：“哪个刘？”熙民说：“卯金刀的刘。”“哪个熙？”“康熙的熙。”“哪个民？”“人民的民。”毛主席风趣地说：“啊，你是康熙的臣民。”又问：“干什么工作？”刘答：“县委副书记。”

主席说：“一县之首，担子重啊。”接着主席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答：“叫辛建。”他老人家又问哪个辛、哪个建？我说：“辛苦的辛，建设的建。”主席听后又风趣地说：“啊，你是辛辛苦苦地在建设社会主义呀。干革命就得有这种不怕辛苦的精神。”接着他老人家又问我干什么工作，在我回答了干公安工作后主席说：“公安工作很重要。”我说：“是的。请主席视察。”其他领导同志也说：“边看边谈吧。”

毛主席一边察看一边同随行人员交谈。我一直紧跟在他老人家身边。他顺着烟叶地垄沟进行察看，露水浸湿了他的衣衫，鞋上粘满了泥土。在二队齐胸深的谷子地里，主席采了几穗沉甸甸的谷穗，手里掂着，这时记者要拍影，主席说：“还是照大田里风吹的大谷穗，让北京的同志看看。”当时社员在田间吃早饭，主席问：“能吃饱吗？有休息时间吗？”社员抢着回答说：“俺这是高级社，吃穿都不愁，争上游吃点苦算啥。”看完郝庄，便去到三里沟乡的梁庄。梁庄村东在地里割草和捉烟虫的大人小孩，看见我们一行人，便从四面八方围拢上来，把毛主席围个风雨不透，看样子他们好象认出了毛主席。一时间，群情激动。有的把锄头和草帽全扔了，立起脚尖、睁大眼睛看毛主席，有的想说什么，但又说不出来。主席面对那些赤脚赤背的劳动群众，心里很高兴，频频招手示意。主席向东看玉米，看豆子，农民们跟着还是看主席。主席向北看烟叶、红薯，农民们跟着转过去，还是看着主席。主席看完后说：“你们这里一派丰收景象，从未见到过这样高大的烟叶子，干的好！”群众说：“这是大跃进，村村搞比赛的结果。”主席说：“玉米、谷子长的也很好呀。”农民们抢着说：“这是总路线的照耀。”当主席看到云南烟叶品种每棵有一人多高、七十多片叶片时，兴奋地说：“很好。”又走到高岗处举首展望，那一片接一片的烟叶地，连绵数十里，浩瀚若海洋，主席情不自禁，高兴地说：“你们这里成了烟叶王国了。”从此，许昌以“烟叶王国”闻名于世。当时主席还询问了谷子、玉米、红薯、烟叶的管理方法、产量，村党支部书记张富贵一一作了回答。接着主席又询问陪同的省委领导同志，河南其他县区的农作物生长情况怎样，社员的生活怎样？对农业社有什么反映？公社是不是发展方向等问题。领导同志一一回报后，主席说：“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啊！”

离开梁庄，毛主席一行驱车前往襄城县城北小张庄。在村边地头的树林下与农民座谈。座谈前，有些群众认准是毛主席，有的高喊共产党万岁！有的跑回家端来洗脸水，拿来羽毛扇，还有的搬来坐椅，但主席都未用，说：“谢谢诸乡亲。”座谈会谈的什么，我无暇顾及。说实在的，我那天把全部精力集中到主席的绝对安全上，眼观四路，耳注八方，只有一个信念，一旦发生意外，宁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保卫住毛主席。当主席视察烟炕时，57岁的烟叶技术员梁运祥正在砌火龙，满手粘着泥巴，主席同他握手，他激动得泪水直流。主席问他：“烟叶不炕，太阳晒行吗？”梁说：“日晒的烟叶子色差，身薄，质劣，无味。”主席点点头。

小张庄座谈会后，毛主席乘三号吉普车从襄城县城北关驶过，他敞开车窗，不时看望街上行走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商店。他精神很好，兴致极高。

上午11点40分时，毛主席一行结束了襄城县的视察，县委领导请主席在襄县城里就餐，主席说：“谢谢，不给地方添麻烦了。”遂乘车返回许昌。途经郝庄时，太阳似火，群众给主席一行送来一些大西瓜，主席谢绝了。下午一时许，主席一行回到许昌县长店，这时，许

（下转第8页）

回忆毛泽东主席视察襄城县

刘熙民

1958年8月6日晚上12点，我忽然接到许昌地委副书记马金铭同志的电话。他说：

“明天上午，中央领导去襄城县视察工作，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同志陪同。”这句话，他反复说了两遍。接着他又说：“为了迎接中央领导的视察，你要亲自负责，连夜作好一切准备。视察点的交通，要保证行车无阻，离城也不要远了，集中一些为好。中午休息、吃饭和安全问题都要专人负责作好。你还要准备一下全县工作情况的汇报。离天明时间不长了，要马上组织行动。明天你在机关等着，地委去车接你。”听着电话，我心情十分激动。听完就立即通知在机关的县委常委开会。常委们高兴极了，有的兴高采烈地说：“真是特大喜讯，什么时候也没有想过中央领导会到我们襄城县视察。”经过半个小时传达讨论，大家一致表示：“连夜作好一切准备，迎接中央领导的视察，绝不辜负中央领导对我们的期望。”中央领导到底是谁？猜来猜去都说不准，但既然是吴芝圃书记陪同，一定是中央主要领导。会后，我们分工负责进行准备工作。张庆雯县长负责吃、住和安全的安排。我带领几个干部，骑着自行车飞一样的在城周围确定视察点，查看行车路线，以保证中央领导视察好。天明前，各项准备工作都作好了，一夜未眠也不觉得一点疲劳。我们都精神焕发，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迎接中央领导的到来。

8月7日，东方刚亮，我正在刮脸洗刷，忽听外边有吉普车声。我赶忙洗刷完毕。不一会儿，地区公安处副处长辛建同志

走进来了，他握着我的手高兴地说：“毛主席来了，已从许昌出发，马金铭书记让我来接你。”啊！伟大领袖毛主席来了！我又激动，又紧张，心要跳出来了。我们慌忙吃了点早餐，就驱车迎接毛主席。

早晨的红日从东方升起，万道霞光普照着襄城县绿色的大地。广阔无垠的田野里到处人欢马叫，颍、汝河南北一片丰收景象。这时正是烟叶收烤季节，遍布在百里大地上的幢幢炕房，冒着缕缕青烟，发出醉人的烟香。1958年是大丰收的一年，8月7日是最幸福的一天。过去我常想：要努力工作，搞好生产，取得优异成绩，争取天安门前见毛主席。万万没有想到，毛主席在日理万机的百忙中，亲临襄城县视察了，我就要见到日思夜想、天天盼的毛主席了！一路上，我想了好多要向毛主席说的话，准备好好向毛主席汇报。

颍河南岸双庙乡郝庄村东的许（昌）南（阳）公路上，停着许多车辆。我们的车开到这里也停下了。这时，毛主席在这里的视察快结束了，在省、地委领导的陪同下，正顺着丰产谷子田绕麦场走过来。我在公路上看到后，心里很不安：我迎接主席来的太晚了。我和辛建同志急忙迎了上去。毛主席头戴草帽，身穿白衬衣和灰布裤子，脚穿半旧棕色皮鞋，神采奕奕，满面红光，精力充沛，健步走来。我匆忙迎上去。许昌专署专员王延太把我介绍给毛主席。毛主席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连连说：“毛主席

好！毛主席好！”毛主席微笑着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那年当县委书记？”我回答说：“我叫刘熙民，今年32岁，1955年任县委副书记。”毛主席又问：“是哪个‘熙’啊？”我一时说不出“熙”字的通俗说法，就脱口而出：“是康熙的熙”。毛主席风趣地说：“噢！你是‘康熙’的人民了！”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这时，毛主席又和辛建同志握手，问他的姓名。当得知是辛建时，就说：“是辛辛苦苦地建设社会主义啊！”这时，我深深感到，毛主席说话风趣，态度和蔼，平易近人。我仿佛在自己父母身边一样，一点也不感到拘束。毛主席就要上车继续视察了，马金铭同志拉着我的手说：“你和省委吴芝圃书记同乘毛主席的汽车，好好向主席汇报工作，回答主席提出的问题。”啊，坐主席的车，我太幸福了。

一辆黑色轿车沿着许南公路缓缓向县城方向行驶。毛主席坐在前面，我和吴芝圃书记坐在后边。一路上穿过了几座跨公路的彩门。有一座彩门上写着：“襄城县双庙乡，超鲁山，跨许昌”。毛主席回头问我：“这是什么？”我说：“这是跃进门。”主席又问：“干什么用的？”我说：“组织生产评比，搞生产竞赛。外边的和鲁山、许昌赛，本县的乡和乡赛。”毛主席继续问：“作用多大？”我向毛主席讲了刘庄乡后进变先进的故事。刘庄乡是县东北边上的一个乡，和许昌县交界。这里过去工作落后，生产上不去，每次评比都是倒数一、二，群众生活也不好，干部抬不起头来。自从搭起“跃进门”，开展竞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干部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起早打晚加强秋田管理，各项工作都有新的起色，和许昌县交界的生产队，田间管理显然大不一样，在全县评比中，一跃进入先进乡的行列。毛主席听完很高兴，他对我说：“开展竞赛，要讲究实效，事实求是，不务虚名。”说到这

里，他问我：“你和人家搞竞赛，到外县参观过没有？”我回答说：“我没去，县委任焕彬书记已经出去参观几天了，回来就介绍外县的经验。”毛主席亲切地说：“你也要出去看看嘛！不亲自去看看，比一比有什么差距，怎么能和人家搞竞赛呢？”我说：

“我一定出去看一看，找差距，学先进，把我们的工作搞好。”主席点点头说：“对啊！一看人家什么样子，就好竞赛了。”当时，生产高潮热火朝天，不少社员正在田间吃早饭，毛主席看到这种情形，就关心地问：“农民休息够不够？生活怎么样？”我说：“今年农业大丰收，农民的生活不错，就是休息差一些，干活起得早睡得晚，一天休息不到8小时。”毛主席关切备至地说：

“要爱护农民的积极性，关心群众的生活，要劳逸结合。要多种一些谷子、豆类，这些粮食营养丰富。”毛主席这些语重心长的话，使我想起他在1934年写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篇光辉著作。我们的党，我们的领袖毛主席每时每刻都在关心着群众的生活，和广大人民群众心连心。

车行中，我汇报襄城县农业生产形势时说，秋季丰收在望，烟叶长势喜人，农民说是五谷丰登。毛主席听着听着，突然温和地问道：“是哪五谷？”当时我太激动了，不知怎样地把烟叶说成‘五谷’之一。毛主席立即说：“烟叶能算‘五谷’吗？”毛主席这一提问，我明白了，很快作了纠正。吴芝圃书记在车内只是听我向毛主席汇报，没有插话，有时点头笑笑。毛主席回头对我说：

“要把农业搞好，光靠两只手不行，还要有农业机械化，农民愿不愿买农业机械？”我汇报说：“今年全县烟叶能收入二千多万元，农民手里有钱，都盼望着早日犁地不用牛，现在是有钱买不到农业机械。”这时毛主席满有信心地说：“不要太急，一定会办到的。”接着又问：“农民办社的情况怎么

样？”我汇报了全县农业社的组织情况，说农民办社的积极性很高，要求走集体化的道路，要求办大社，好使用机械化。毛主席笑着点头说：“这很好啊！”

8点多钟，毛主席乘坐的汽车在县城东下了许南路，顺着一条向东的土路，来到三里沟乡后梁庄村北。毛主席一下车，就被田间劳动的群众认了出来，个个拍手欢笑，惊喜万分，一齐拥来欢迎。毛主席微笑着和群众一一握手。人们看到毛主席身材魁梧，红光满面，步子稳健，都为毛主席的健康而庆幸。毛主席握着社员李林头那双长满老茧的手，亲切地问：“这是什么庄？你在这里干什么？家中有几个孩子？”李林头一一回答了。毛主席指着我问周围的干部和群众：“你们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是作什么的？”有些人回答毛主席：“他叫刘熙民，是县委副书记。”我当时想：毛主席既关心群众，又关心干部，他问社员认不认识我，是看我是不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这件事使我深受教育。我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深入群众，和群众同呼吸共患难，当好人民的勤务员。

毛主席经过麦场顺烟垄走进烟田，看到一部水车在井台上停放着。他走过去看了看，问我和三里沟乡副乡长周天顺：“这叫什么水车？井里的水够浇不够？一天能浇几亩地？”我们回答：“这是解放式水车，井里的水够浇的，一天能浇五、六亩地。”毛主席又看了看水井，健步走进大面积烟叶丰产田。在地头，他抚摸着一株株棵高叶大绿里透黄的烟叶问：“这是什么品种？长的这么好啊！”我说：“长脖黄。这个品种产量高，质量好，抗灾能力强，农民喜欢种。”毛主席详细询问了烟叶的管理措施和收烤技术。我在主席身旁一边走，一边汇报。当走到二茬烟旁边时，我告诉毛主席：“这是二茬烟，头茬已收烤完，只要加水加肥，加强管理，二茬烟也长得很好。”毛主席指着二茬

烟风趣地说：“孩子长得比妈妈还高。”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毛主席看看这，问问哪，连香烟也顾不上吸。在他从大片烟田走向村边的时候，从衣袋里拿出一包“彩蝶”香烟。他抽出一支不先吸，却让省委书记吴芝圃、省委常务书记杨蔚屏、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等人吸，他们摆手回答：“不吸”。又给马金铭、王延太，也是不吸。然后又给我。我很恭敬地接过了烟，心想作个纪念吧。可是我心里又七上八下地想：为什么省委书记、地委书记会吸烟不接烟，我不会吸烟反而接了？这对不对呢？可能是对主席的东西不能随便接吧。我立即靠近毛主席说：“主席，我不会吸烟，把这支烟送还您吧！”毛主席当时已觉察到大家都不接烟的心情，他接过了烟，很温和地说：“我连一支烟也送不出去啊！”这以后，对别的干部、社员再也没有让烟吸，自己点燃了烟吸着走着。毛主席问王延太：“你们的烟好，还是山东潍县的好，你们比较了没有？”王延太回答：“现在全国12个省烤烟会议正在这里开。他们说这里的烟长得不错。”毛主席满意地说：“在你们这里开会，你们的烟要比他们好。”毛主席在烟叶试验田里走着，健步登上田间路埂，举目四望，只见烟田一块连着一块，一块比一块强，真是烟林、烟海，无边无际。毛主席兴致勃勃地对马金铭说：“你们这里成了烟叶王国了。”毛主席的高度赞誉，使我们听了深受教育、鼓舞。旧社会，襄城县广种烤烟，襄城“里川烟”尤其著名，可是烟农的命运掌握在帝国主义、资本家和地主手里，不少人家被逼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解放后，在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烟农翻了身，为国家种烟，烤烟生产得到很大发展。现在毛主席赞誉襄城县是“烟叶王国”，怎么不使人振奋呢？

毛主席不顾暑热，不辞劳苦，又走进村

南第三生产队一块“云南多叶”品种试验田旁。这里烟棵9尺多高，顶上还没有“冒花”，烟叶又大又多，密密实实，撒土不漏。毛主席用手轻轻分开烟叶，探身向里望了望说：

“这不透风，用绳子攀起来，拉一拉就好了。”我和跟着的干部回答：“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这样办。”毛主席走出烟叶试验田，健步走到村南一棵高大的皂角树下。这棵树枝繁叶茂，粗大的枝叉伸向四方，象一把撑开的大绿伞，迎候客人来树荫下乘凉。毛主席擦了擦脸上的汗，吸着香烟，在这里稍加休息，就驱车走了。后梁庄的干部群众热泪盈眶，恋恋不舍，大家拍着手欢送毛主席。毛主席也从车窗上不断挥手。汽车走上了进城的公路，社员们还不愿离开。

10点多了，毛主席乘坐的汽车来到城东关，看到城门上写着“学孟县，赶孟县，超孟县”9个大字，就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汇报说：“我们县今年小麦产量虽比历史上哪一年都高，但还比不上孟县。为了赶上或超过孟县，经过县委研究，提出这个口号，激励干部群众前进。”毛主席问吴芝圃：

“孟县的小麦就是好啊？他们的产量是多少？”吴芝圃汇报了孟县的产量，然后说：

“今年孟县的小麦产量在全省最高，是红旗单位，现在不少县提出赶孟县，超孟县……”当时，我看出毛主席已察觉到我和吴芝圃汇报的小麦产量有浮夸，因此他听了只点头不表态，但也没有批评。停了片刻，对我鼓励说：“你们要鼓足干劲，明年超过他们嘛！”我说：“我们一定大干苦干，把劲鼓足，争取明年超过他们。”汽车进了城，缓缓通过东大街、北大街。城内的街道刚修好，很平坦。毛主席问：“这路是什么时候修的？修得不错啊！”我说：“春上修的。这条路原来是石块铺的，因年久失修，路面七高八低，走起来很不方便，县委发动群众，扒掉石头块，自己动手用炉渣、白灰、小石子掺

土混合修成的。”毛主席高兴地说：“还是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好。”汽车在大街上慢慢行驶，毛主席不断透过车门观看街上的来往行人。不少人注视着车内的人，忽听得有人指着说：“是毛主席。”汽车在城内没有停，从北大街出城，顺着襄（城）禹（县）公路来到十里铺乡薛园农业社小张庄生产队。

毛主席下了车，没有休息，就视察小张庄的农业生产。他仔细看着烟叶丰产田地头插的牌子。马金铭、王延太在一边回答问题。当时，正在开现场会的乡、社干部和在田间劳动的社员，看到毛主席来了，人人欣喜若狂，拍着手，从四方八面拥来。刘天顺、胡振怀、吴彬、赵春田等干部跑在前面，首先和毛主席握手。他们望着毛主席慈祥的面孔，有很多话要说，但又激动得说不出来，只是说“毛主席好！”“毛主席好！”毛主席沿着田间生产路视察了大面积丰产田，询问了烟叶的产量和农民收入情况，还视察了附近的李庄、下徐等生产队的玉米、红薯。他看到一块红薯地搭了架，上边爬满了红薯秧，就问“这是什么？”我说：“今年红薯秧子长得大深，社员怕不透风，影响红薯生长，就在地里搭了红薯架，让秧子在上边长，薯块在地里长。”毛主席听了很高兴，笑着说：“你们看，红薯也住高楼了！”在场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毛主席一边走一边看。所到之处，庄稼一块强似一块，烟棵高过人顶，烟叶肥大油润，微风吹过，烟香四溢，丰收景象，十分喜人。毛主席吸着烟，激情满怀地说：“应该让吸烟的人都来看看。”

毛主席就要进村了，新华社摄影记者侯波还在红薯地里拍照。毛主席兴高彩烈地对她说：“你不要走了，把你留在这里吃红薯吧！”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侯波爽朗地笑着，跟着毛主席向小张庄走去。

毛主席进村后，在一个遮荫的布棚底下停住。这里放了方桌和板凳，方桌上放着瓷茶壶和茶杯。毛主席站在桌子旁同来迎接的干部、社员一一握手。第二生产队队长李代岭，看到主席热得满脸是汗，急忙回家端来一盆清水，请主席洗脸，又倒了一杯茶水，让毛主席喝，社员黄中仁搬出一把老式椅子，请毛主席坐下，社员张发祥的母亲听到救命恩人毛主席来到家门口了，高兴万分，急忙拉着孙孙，带着儿子和媳妇向毛主席走来。毛主席看到这一家三代人，异常高兴，亲切地向她们问好。这个在旧社会受苦受难的人，今天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和问候，心里激动万分，她什么话也说不出，只是含着热泪，高呼“毛主席万岁！”一语透出众人心，一呼激起万人情，顿时，“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小张庄上空，毛主席站起来，微笑着，不断招手向群众致意。小张庄学校的小学生，在老师带领下，排着队来了，同学张国卿来到毛主席身边，恭恭敬敬地向毛主席敬礼问好，献上大红花。李深义、张国卿、张英同学把手伸向毛主席，主席高兴地把三只小手握住，和霭地笑了。毛主席从李深义手里接過一本初级小学算术课本，一边看一边问：“你多大了？叫什么名字？”李深义答：“我10岁了，叫李深义。”毛主席把课本递给他，亲切地教导说：“要好好学习。”

中伏的骄阳，散发着烫人的炙热。社员们烧好的茶水，一壶又一壶的送来。毛主席一边喝茶，一边吸烟，不断地向社员招手，表示谢意。停不久，毛主席站起来，到一座烤烟房视察。正在炕房修理火垄的烟叶土专家梁云祥看到毛主席来了，赶忙出来迎接，恰好在炕门口相遇。当他与毛主席握手时，才发现自己手上的泥巴还未来得及洗哩。毛主席在梁云祥、马金铭、王延太和我的陪同下，又来到东边一个炕房。炕内装着210杆

烟叶，正是大火烘烤阶段，炕内温度达华氏120度。梁云祥把盖炕门的草苫子掀开，烤烟散发出扑鼻的芳香，同时涌出炙人的热浪，使人难以进前。毛主席冒着高温进入炕房，从烟杆的空隙里向上望，他见到满炕金黄色的烟叶，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他从炕烟房里出来，问梁云祥：“炕烟好，还是晒烟好呢？”梁云祥回答：“炕烟质量好，色气黄，油分大，叶片厚，香味浓，炕烟比晒烟好。”主席点点头表示赞同。这时，襄城县县长张庆雯赶来了，王延太同志立即介绍给毛主席。张庆雯向毛主席问好。毛主席亲切地和他握手，问他的姓名和工作情况，张庆雯一一作了回答。接着，十里铺乡党委书记宋来生迎上来，我向毛主席作了介绍。毛主席也同他亲切地握手，问他叫什么名字，宋来生答了。又问：“哪两个字？”宋来生一时激动没有说清，我就在手掌上写了写，告诉毛主席。毛主席又问宋来生：“晒烟好不好？”宋来生说：“晒烟质量不好，颜色不鲜，烟叶薄，味不香。这里都是烤烟。”毛主席又说：“你们试一试嘛？”宋来生说：

“过去炕烟，有的户没有煤，就晒烟，结果晒出的烟不值钱，没人收。”毛主席频频点头，表示同意宋来生汇报的意见。听了毛主席的这些问话，我深受教育。他老人家对一件事情调查得多么认真，多么踏实。视察中光晒烟好不不好的问题，他就问了又问。我今后要进一步做好调查研究工作，遇事多问一个为什么？毛主席来到小张庄的喜讯，很快传遍了周围的李庄、黄路口、上徐、下徐、赵堂等村。那里的干部、社员纷纷赶来看望毛主席，三里沟乡副乡长周天顺还特意送来了一个大西瓜。毛主席拍了拍西瓜，称赞说：“这个西瓜真大，谢谢！”11点40分钟，毛主席就要离开这里，广大干部、群众多么想请毛主席在这儿多停一会啊！多想再听听他的教诲呀！我也请求主席回县委机关

吃午饭。毛主席说：“不停了，还要赶路。”吴芝圃同志插话说：“主席的视察时间都安排好了，不能再去县委了，要直接返回许昌。”毛主席向大家频频挥手，上车后又从窗门口挥手致意，向干部群众告别。车慢慢地开动了，人们跟在车后，鼓掌欢呼，送呀！送呀！一直送到看不见了，还久久不肯离去。

汽车沿着城外的襄（城）郟（县）公路走上许南公路，向许昌方向奔驰，我和吴芝圃书记仍坐在毛主席的后边。一路上，毛主席还是问这问那，研究问题。他说：“农业社叫高级社好？还是叫集体农庄好？”我回答说：“农民说集体农庄好。”毛主席点了点头，没有表示什么。毛主席的车和其他随行车到襄城县和许昌县的交界处都停下了。马金铭书记走过来对我说：“你送到这里就行了。用车把你送回县城去。”我下车后，问毛主席还有什么指示，毛主席握着我的手亲切地说：“你们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啊！”我激动地向毛主席表示：我们一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保证完成今年农业生产计划，把红旗插上高峰。毛主席高兴地挥着手说：“再见！”这时候，吴芝圃、马金铭乘坐毛主席的汽车，向北奔去。

下午，我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传达了毛主席视察襄城县的幸福情景和重要指示，讨论了争取秋季大丰收的新措施，决心以更

大的成绩，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喜。8月8日上午，我们在城内召开万人大会，传达毛主席视察襄城县的指示，动员全县人民在毛主席视察的鼓舞下，鼓足更大的干劲，掀起新的生产高潮，用优异的成绩，回答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会后，县、乡、社干部深入基层，分片包干，带领广大群众大抓秋田管理，加强二茬烟管理，农业生产搞得热火朝天。经过全县人民的辛勤奋战，夺取了史无前例的农业大丰收，被地委、专署评为先进县。我和十里铺乡党委书记宋来生、城关镇镇长李留成于十二月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以毛主席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全体代表，我又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毛主席同中央领导和我们全体代表合影留念。国务院向先进单位颁发了奖状和纪念章。开完会，我带着党中央、国务院的重托，光荣地回到了毛主席视察时高度评价的“烟叶王国”，继续奋斗，为党争光，为祖国争光，为毛主席争光。

（本文作者刘熙民，1926年生，山东省莱西县人。1945年参加革命。1948年南下到襄城县工作，历任区长、中共区委书记、县委副书记等职。后任许昌地区农林局局长、中共舞阳县委书记、许昌行署农委副主任兼许昌地区农机局局长。1983年离休。）

（上接第2页） 昌地委副书记刘毓敏（女）、组织部长康国蕴等带着三尺长的大豆角和大烟叶送给主席观看。主席说：“很好。”接着，主席准备乘专列北上。我同朱干同志把主席送上火车后，上级保卫人员说：“你们已完成保卫任务，不再远送。”当时，我真不愿离开毛主席，多么想能同他老人家多呆一会儿啊。主席象是看透了我的心思，再次伸手同我们相握，并说：“你们辛苦啦，谢谢，再见！”我连声说：“主席一路平安，一路平安……”我的泪水再次泉涌而出。列车远了，我们还依依不舍地目送……

下午主席的专列在长葛和尚桥车站暂停，并下车步行五、六里，视察了长葛县宗寨村。

（作者辛建同志，历任许昌专署公安处副处长、县委第一书记、中共许昌地委委员、副秘书长等职。本文编辑周进勋。）

毛主席视察长葛纪实

胡大毛

1958年8月7日，是长葛50余万人民永远难忘的一天。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百忙之中，亲临长葛视察，使长葛人民倍受鼓舞。笔者作为当时参与筹备接待的工作人员之一，对毛主席视察长葛的全过程，至今仍记忆犹新，特纪实如下。

当年8月7日中午12时许，毛主席乘坐的专列徐徐开进长葛和尚桥车站，停稳后，陪同主席视察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和秘书张永昌走下火车，向前来迎接的长葛县委第一书记吕炳光、副书记王连安简单交待视察意向后，就让吕炳光和王连安同志登上主席坐的车厢，吴芝圃把他俩介绍给主席。当时，他们俩个因心情过分激动一时不知说啥是好。毛主席非常慈祥地问他们各叫什么名字？任什么职务？哪里人？那年到河南来的等。他们俩分别作了回答。当毛主席听说他们都是1948年从山东来河南工作时，当即屈指一算说：“啊，您已来十多年了，已成河南人了”，顿时说得大家都笑了。紧接着毛主席说：“下车看一看吧”！立刻一起走出车厢。

毛主席头戴一顶细白草帽，上身穿白色衬衣，下身穿银灰色裤子，脚穿一双红色旧皮鞋。当时虽正值骄阳似火的中午（12时40分），但他老人家依然神采奕奕，红光满面，毫无倦意地和秘书以及吕炳光、王连安同志乘坐在一个吉普车上先行。吴芝圃同志与主席的其他随从人员及省、地陪同视察的负责同志乘坐另几部车子后跟。当毛主席乘坐的吉普车行至向宗寨田间拐弯

路口时，因视察的头一天下大雨把路冲坏了，车子无法过去。王连安同志急忙下车说“我去叫人修路”，毛主席说：“不要去叫人了，咱们下车走过去”。下车后，毛主席漫步沿着生产小道，视察了一块40余亩的麦茬晚玉米，当他老人家看到株高近七尺，长势茂盛，而且管理精细，田间无杂草的玉米田时，连声称赞，并很有风趣地说：“你们长葛无葛（意无杂草）啊！”这时，王连安同志找来了宗寨村（当时为“五四”农业社，后改为八七大队）党支部书记赵献章，吕炳光指着赵献章向毛主席作了介绍。毛主席高兴地同赵献章边点头边握手，这时，赵献章激动得已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连声说“做梦也想不到您老人家会亲自到俺这里来看看！”这时，已经是中午一点多钟，三伏天的正午，加上雨后天晴，高温猛升，七尺多深的玉米地里又闷又热，毛主席挥汗如雨，衬衫全被汗水浸透了。但毛主席兴趣很浓，继续向玉米地间走去。当途径一条宽路沟需上坡时，吕炳光等同志竞相向前搀扶，毛主席和蔼可亲地说：

“不用，我可以上去。”在一块谷子地边，新华社记者候波给主席照了张像。毛主席一边打着手势，一边说：“干嘛光给我照像呀！去照群众嘛！”之后，毛主席又来到一块长势更加茁壮的玉米试验田，用手抚摸着长势喜人的玉米精心细看之后，接着又向玉米地里边走了大约三、四十米，双手叉腰，仰视东方两分钟左右。毛主席高大魁伟的身材，出现在嫩绿肥壮的玉米丛中更展现出了“东方红、太阳升”的雄伟气

魄。记者候波、杨震河同志以最敏捷的动作给主席及在场的省、地、县领导同志摄取了这珍贵的历史镜头。毛主席擦了擦汗，回过头来，以伟人的风度和农学专家的兴趣向赵献章详细询问了玉米地翻了多深？分层施了多少肥？浇没浇塌地水？犁耙几遍？啥时间下种？搞几次间苗？浇了几次水？计划产量多少斤等等。赵献章一一作了回答。当赵献章汇报到玉米计划亩产两万斤时，毛主席耐心细致地以科学的计算每亩棵数，每棵棒子数，每棒千粒重数，启发人们把冲天的干劲和科学的态度结合起来，认真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听罢赵献章汇报和简要交谈之后，毛主席接着问吕炳光同志今年全县玉米的单产，吕回答说：“保证一千五百斤，争取两千斤。”毛主席笑了笑继续往前走。走出玉米地，接近宗寨村，毛主席问道“这是什么村”？王连安同志边答边用手指在地上写出“宗寨”二字，请主席看。毛主席问“有多少户？”王连安回道“二百多户，一个高级农业社”。毛主席又问赵献章“生产队的规模大了好？小了好？”赵答“大了好”，毛主席说“适当大一点好。”边说边返回走。又上了一条沟坡，毛主席看见路边的一棵桐树，说“啊！桐树”，吕炳光回答说“是桐树”。毛主席接着说：“桐树好啊！可以出口，日本喜欢我们的桐树。”吕炳光说“这

里的桐树长得不够好，我们县大墙周一带桐树长得很好，很直，都支援出口了，日本买的占多数”。当走到一条水沟旁，毛主席看到水沟里长有水浮莲，他老人家更富有情感地说：“水浮莲好啊，可以喂猪。在我们南方用处广啊！”在大路旁，毛主席同前来陪同视察的省、地、县以及村的同志一一握手。吴芝圃、吕炳光、王连安等陪同毛主席乘车返回和尚桥车站，在吉普车上和下车后，毛主席再次听到吕炳光向他汇报全县玉米单产保证一千五百斤，争取两千斤时，毛主席笑着问吕炳光“能达到吗？”吕回答说：“一定达到！保证秋后到北京给毛主席报喜。”毛主席仍然笑着说“拿到手，才算数。”说罢，毛主席再一次同在场的同志一一亲切握手告别。专列一声长鸣，向省会郑州方向开去。

1958年8月7日的12时至下午2时30分毛主席在长葛视察。在这幸福难忘的两个半小时中，长葛人民深受鼓舞和教育。三十余年来，毛主席视察长葛的动人情景，时刻激励着全县人民奋发图强、艰苦奋斗，不断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新的贡献。

（本文作者胡大毛，曾在中共长葛县委办公室、组织部工作，现任长葛县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本文编辑 姚宗堂）

（上接第57页）

兴地对人说：“这是我平生最大的幸福！”在党和人民的关怀和鼓励下，他老当益壮，在医务工作的岗位上积极钻研医术，秉性沉稳而善思，待人和蔼而亲切。他在诊疗外还经

常去许昌专区西医学习中医班讲课、并著《中国儿科要诀》（未出版），为社会主义医疗事业作出了贡献。

（本文编辑：凌云）

殒落一颗大星

舒楚词 殊水曲

作于1939年秋

舒楚1988忆记

E $\frac{4}{4}$

(江上青烈士挽歌)

3 · 3 3 —	5 3 2 1 3 —	3 3 · 2 1 2 7	7 1 6 — 0
秋 风 里	殒落一颗大	星,殒落一颗大	星。
1 · 7 6 —	3 · 2 1 2 3	2 · 3 1 7 6	6 — — 0 3
你 去 了,	带 着 音 响,	划 过 长 空	在
5 5 6 3 6 0 5 0	3 2 1 6 1 2 3	0 3 2 2 2 3 5	2 2 3 1 2 7
封建余孽手 里,	溅了你的热 血,	让几十里的弱	流,亲吻你的尸
7 1 6 1 3 1	2 3 3 2 7 1 2	7 · 7 1 —	1 0 6 · 7
身,无 限 的	哀 痛,刻上我们的	灵 魂。	死 者
1 — 6 1 2 1 6	1 2 3 3 5 3 2	1 2 3 3 2 1 1 2	2 · 3 5 3 2 1 2 3
啊, 你 是 生花	妙笔的江淹,你是	朗朗 照 人的玉山,	你是铁腕 斗胆的
5 6 2 3 5 3 2	1 6 3 — 3	3 0 6 · 7	1 — 5 3 6 5
股肱打 开 皖东	北的 今 天。	死 者	啊, 愿 你 手 持
6 5 5 3 1 2	6 5 0 3 · 3	5 5 6 1 6 0 0	6 · 6 1 1 2
巨 灯,照耀 我们	前 行,抹 干	泉涌的眼 泪,	掀 起 倒 海 的
3 2 3 7 · 2	6 — — —		
颶	风!		

五十年前的一曲悲歌

房西华

今年八月二十五日《河南日报》第三版刊载了江上青烈士的略历。烈士牺牲已整整半个世纪了，他是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在皖东北泗县被反动派杀害的。我这里抄存有当年抗演六队同志所作的悼歌，深沉悲壮，低声咏唱，难禁心潮起伏，联想很多。这支很能反映抗日战争年代艰苦斗争和先烈不朽业绩的悲歌，是当时血与火的伟大斗争的一个印记。感人至深，蕴含着丰厚的教育力量。歌词和曲谱都特别好。歌词的作者舒焚是我的好友，因之我有幸较早地得知江上青烈士的事迹，并从这支悲歌中领受感染和教育。几十年间经过战争和时日的变易，对这支歌都已记忆不全，连舒焚也是如此。近年，舒焚同他的六队战友得以重新聚首，共同回忆，整理出来，这是弥足珍贵的。但至今还没有公开发表。因此，我把它作为一份历史资料加以提供，以有利于存留和参考。

江上青烈士的事迹，《河南日报》已有介绍。舒焚近年也有回忆。去年九月二十七日他给泗县党史工作委员会的信中说：“一九三九年春，抗演六队从皖西出发，在盛夏到达皖东北。江上青同志作为专署秘书主任对我们的到达，十分欢迎和关心。几次到我队住处看望，与我们交谈。……当得知他是一位上级党派到皖东北工作的党员，在协助盛子瑾打开皖东北抗日局面中起了很大作用，在贯彻我党抗日主张上做了许多工作时，内心非常敬佩。他在写作、办事上的才华，吸引人的谈吐和潇洒的风度，都使我们深为我党有这样忠诚能干的干部而高兴，并愿好好向他学习。他因公到各地处理各项工作，顽固派竟丧心病狂地在淮河上对他所乘的船只实行罪恶的袭击，他为抗日的神圣事业，为很好地完成党的任务，英勇牺牲了。在悲痛和愤怒中，我写了一首题为《陨落一颗大星》的诗，队内领导和同志们认为尚能表达我们当时内心情感于万一，因之由张君亮同志为之谱了曲。在追悼会上，除了队长陆万美代表全队致了悼词外，同志们就悲愤地唱了这支歌，表示我们对江上青同志的深沉悼念。”去年舒焚在回忆整理出这支歌时，写信给我们谈到：“这支歌的词和曲，久已疏忘，记忆不清，一次在北京与六队老同志聚首，由张葳、张育品两位女同志慢慢回忆起来，尤以张葳记得齐全，他的老伴韦宏是音乐家，原请他帮助整理，但他因病未能搞成。于是，我回忆追记如上。”最近，即九月四日舒焚来信中又谈到：“在皖东北时，我十九岁。印象中他（指江上青同志）也正是比我大个七至十岁的样子。个子好像并不很高，很清秀的样子。长得比较年轻。记忆中听说他是在淮河中的船里被狙击牺牲的。殊水同志谱曲的悼歌，曲子很好，我觉得我写的词还不足以写出他的优点。或者在悲壮方面还表现一些。”

舒焚是个很有才华又十分谦虚的人，一九三九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为湖北大学教授。

关于曲作者殊水即张君亮，是一位革命艺术家，音乐才赋尤其卓越。也许我有点个人偏爱，认为他的作品表现革命情操，激励人民奋进的力量及艺术上的高超，可与聂耳、冼星海、张曙等的名作相提并论。只是未为多人所知。

江上青烈士生前工作的皖东北，是淮河以北，津浦路东、洪泽湖畔、苏皖交界的抗日游击区。国民党行政区专员兼第五游击司令盛子瑾与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有严重矛盾，盛表现较好，盛的部队及行署里有共产党员和进步力量在活动。因此，这一带也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进步力量工作进展较好的地区。抗演六队，即抗战时期著名的十个抗敌演剧队中的第六队，由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组成。在共产党的领导、关怀下在鄂皖苏鲁战地工作。一九四一年遭到国民党苏鲁战区顽固势力的迫害，历尽艰辛撤回到新四军。

抗演六队的同志满怀悲愤，悼念自己的战友，指斥顽固派的罪行。对于江上青烈士，比作光灿灿的“大星”，或质朴地称作“死者”，而没能用“烈士”、“战友”、“同志”这样的内心想要呼唤的称谓，这是当时具体斗争环境使然的。但是，《殒落一颗大星》词曲，仍然明朗、有力地表述了烈士伟大、崇高的形象。最后的“愿你手持巨灯，照耀我们前行，抹干泉涌的眼泪，掀起倒海的飓风！”直是惊天动地，气壮山河！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

《殒落一颗大星》是激动人心的悲壮悼歌，也是坚毅雄壮的革命战歌。今天我们咏唱起来，仍然不禁热泪盈眶，热血沸腾。对革命先烈肃然起敬，无限追怀。同时，也会深感作为后来人的应有的光荣责任而自勉自励。我们应该不忘革命历史，继承先烈遗志，发扬革命精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

根据战争形势的需要，吕公良先后担任界首、周口两地警备司令。在周口为群众修建了一个文化娱乐场所，还修建了一个大礼堂，并亲自题写大礼堂堂名。他在界首、周口两地为政清廉，深得地方好评。

1942年冬，奉命以周口警备团与其它部队合并，组建新编二十九师，吕公良任中将师长，在新郑县城郊整编训练。他治军甚严，天天下连队查看新军训练。1944年春节，奉命进驻许昌。5月1日，在保卫许昌的战斗中，身先士卒，坚定顽强，使敌人付出了巨大代价。最后终因孤立无援，造成全师败局。在率军突围中，不幸以身殉国。

吕公良早在20年代就同情革命。他在蕲县八中读书时的同学孔昭霖，原是中共地下党员，曾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关押在杭州陆军监狱。吕千方百计托人把孔昭霖营救出来。1938年又将孔昭霖、周元挺（是中共地

下党员）二人介绍到十三军八十九师参加抗日战争。

吕公良面容清俊，体高而稍瘦，仪表端庄，风度翩翩。不抽烟，不喝酒。十分注意军容军纪，盛夏酷暑他的上衣领扣也系得整整齐齐，寒冬腊月也从不将两手插入裤袋内，始终保持着一个高级将领的良好作风。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许昌县政府曾召开追悼大会，悼念为民族战争献身的抗日健儿和吕公良师长。1946年秋，吕公良的家属将其遗骨从许昌迁葬在浙江杭州西湖之滨。

1986年1月，吕公良经中央军委浙烈褒字第00066号指令批准为烈士。

（本文撰写者孙浩，今年71岁，大学专科毕业，与吕公良同乡，原29师中校参谋。建国后，任上海市闸北区教育学院教师，现住上海市延安路中段，本文编辑赵金鉴）

许昌抗日保卫战纪实

· 赵金鉴 ·

1944年4月下旬，故都许昌战云密布，人心惶惶。城内富商大贾，有的携儿带女，有的搬运东西，匆匆忙忙，四乡逃难。国民党守城部队，深沟高垒，戒备森严。和尚桥、长葛城已被日军攻占，其先头部队已进犯至许昌城北丈地、杜寨一带。晚上往北可以看到一堆堆熊熊烈火，不时还可听到隆隆炮声。战争气氛异常紧张。

日军进犯

许昌，平汉路上的重镇，豫西南“国统区”之门户，叶县汤恩伯总部的一个外围据点。战略地位重要，为兵家必争之地。对于这样一个城市，日军没有等闲视之。4月中旬，他们突破暂15军27师中牟防线过黄河之后，把进攻矛头直盯许昌。但在他们侵占了和尚桥、长葛城之后，不是直攻许昌，而是调配武力，进行侦察，经过5天准备之后，才于4月29日晚上8时，以第十二军三个师团的兵力，和多兵种配合，分3路向许昌扑来，东西绵延80华里，企图一口吃掉国民党许昌守军。敌第六十二师团走西路，由石固出发，经小宫、泉店、水潮店、椹涧，前锋抵颍河北岸，其中一股迂回于贺张、水道杨、茂武张、灵井等村。其目的，一是阻止由西南来增援的国民党军队，二是扫清灵井、泉店间的障碍，截断许昌守军向西南的退路，为攻占禹县作准备。敌第三十七师团是进犯许昌的主力，一股由丈地出发，29日24时进入城北尚集一带，准备攻打

北门，另一股由杜寨出发，29日拂晓，进入城西半坡铺、长店街、贺庄、七里店、长村张等村，准备向西门、南门发起攻击。敌师部则由苏桥乡之狮子路口，经过李门、河街，于4月30日早上6时到达河街乡的白兔寺。敌二十七师团行动较为迟缓，由城北丈地出发，4月30日中午，进犯到城东北于庄、十里庙一带，封锁由许昌城撤出的国民党军队。敌独立混成第七旅团，由许昌东部迂回前进，4月30日上午，进犯到城东南郊，和敌三十七师团相呼应，并开始了进攻。敌骑兵第四旅团，经城东白雉、五女店南下，4月30日早上进犯至城南蒋李集以南地区游动，和第六十二师团相呼应，防止国民党军队过早地从许昌城脱出，及防止南来的国民党援军。敌人各攻击部队于4月30日拂晓进入预定地点，完成了对许昌城的包围，6时许，在塔湾、思故台、五郎庙、北俎庄等地先后开始了攻击。

我军阻敌

日军进犯虽然气势凶猛，但也不是如入无人之境。许昌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素有抵御外患的决心，大敌当前，一心抗日，是人心所向。日军所到之处，也遭到地方团队和国民党泛东挺进军的拦截与阻击。在城西：当敌六十二师团先头部队进犯到灵井寨时，以镇长王天元率领的区队数十人，虽原系当地百姓，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并没有星散，隐蔽在灵井寨南一坟地进行伏击，枪战

激烈。此时笔者10岁，正在灵井东北七里麦田里躲避，夜半听到枪声大作，第一次耳闻了炽烈的枪声。战斗中我战士刘伯仁、慕焕章中弹牺牲。为此，事隔三天，鲁山方面（国民党河南省府当时在鲁山）还传出了一则“新闻”：许昌灵井发生激战，我600人（与刘伯仁谐音）壮烈牺牲。在城东，敌骑兵第四旅团按计划从五女店东侧向南进犯时，遭到了国民党泛东挺进军独立第三旅第五团苏干城部，和四省边区第一纵队康乐山部的坚决抵抗，迫使日军改由五女店西向许昌以南进犯。在城南三券桥、蒋李集东郭桥，都有国民党地方武装阻击。5月3日，当时《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曾对许昌抗日保卫战有消息报道，如“许昌东南激战”、“许昌四郊我军阻敌”等。1944年5月3日，《解放日报》登载新华社延安3日电称：“向许昌进犯之敌增至万余，分三路围攻许昌县城。1日上午侵至南关，我守军奋起阻击，在四郊展开激战。另一股经石固南窜之敌，被我截击于颍桥。”这说明，当时延安对许昌战局的发展也很重视。可是，这些阻击虽起到一定牵制作用，但根本动摇不了日军南下的决心，有些阻击则是以卵击石。在这里，我决不是埋怨中国军队不能作战，而是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太大了，加之政治上的因素，抗击失败是在预料之中。但在大敌压境的严峻形势下，地方上一些自卫团队能拿起武器，不怕牺牲，勇敢地同强大敌人搏斗，这就表现了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抵御外来侵略者的可贵精神。

许昌激战

大战迫在眉睫。“死守许昌”是汤恩伯的命令，也是重庆最高统帅部的意旨。许昌守城部队为国民党新编二十九师两个团，和许昌五区专员公署的两个自卫中队，计2千

余人。1944年春节期期间，新编二十九师奉命由新郑赶赴许昌，阻止日军南下。该师八十六团部署在和尚桥，作为许昌的前哨阵地。蒋介石对保卫许昌这个据点极为重视，曾命令汤恩伯发动积极攻势，进行许昌会战。汤遵照命令，派泛东挺进军对日军右侧背后进行攻击；派李仙洲指挥的第二十九军急速向襄城、禹县挺进，以攻击日军左侧。并命令新编第二十九师吕公良部死守许昌。吕也期待李仙洲指挥的机动部队攻击日军侧面的作战获得成功。因此士气高昂，斗志旺盛。正当此时，吕公良的家属从后方南召来到许昌，当即被吕迁返，不许停留。当夜，吕公良因处理军务，深夜未回师部，在城内城防司令部联络处住宿。军需官薛浩问他：“战争还未打响，又是春节，太太既带孩子前来看你，为什么不留她们住两天？”吕公良说：“指挥官应以身作则，才能上下一心，共同对敌。大敌当前，军纪、民心非常重要。”他曾告诉他的家眷：这次保卫许昌，任务艰巨，已做好与许昌共存亡的决心。在一旁的孙浩有风趣地说：“许昌是历史名城，曹操曾在这里称雄于世。你治军之严，到有点象当年曹操那样严于律己、割发自裁的故事。”吕说：“我可没有曹孟德那样雄才大略，但决不能象曹操那样叛汉不忠，被后人所唾骂。作为一个军人，为国家为民族，抵御外侮，是我们的天职。我所担心的倒是我这个师整训时间短，缺少大战经验。不象当年我们十三军八十九师打南口、会战台儿庄那样坚强能战。”

新编二十九师的守城布防情况是：八十五团守北门、东门及东关外三里桥、罗庄、塔湾一线，并派往北咀庄一个连，作为师的前哨点，团部住三里桥；八十七团守南门、西门及南关、思故台、五郎庙、西关；自卫中队、保安团等地方武装，守城内南门以东及文昌阁等，统由城防司令部指挥。城防司

令吕公良，城内设一城防司令部联络处，以联络地方党政军各方面。二十九师师部开始住碾上村，4月下旬迁南关远大卷烟厂，4月30日上午，撤城内东大街商务会和霸陵中学。在布防与修筑工事的同时，对全体官兵进行了战地动员，做好了思想准备。4月中旬日军突破中牟防线后，许昌感到吃紧。师长吕公良于4月24日下午，在城内隍民社召开排以上军官誓师大会，邀请地方党、政、人民团体负责人参加，进行战前动员，表明二十九师与许昌共存亡的决心。吕公良在大会上说：“守土抗战，保家卫国，人人有责。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要有必胜的信心，要有与许昌共存亡的决心，誓死保卫许昌城！”会后处决了3名日伪汉奸，并贴出布告，向许昌父老表明二十九师守许昌的决心，劝告许昌人民有计划的疏散，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和损失。布告上落款是：“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许昌城防司令吕公良”。4月25日，各防守部队进入岗位，严阵以待。

4月30日上午7时许，四郊前哨阵地与敌人打响。思故台：我守卫部队一个连，凭借工事，居高临下，沉着应战，给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据城南李简村农民王春岭说：

“那年四月初八早上，我去刨树，被日军抓住，要我给他带路，去到思故台南边，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拦截。日军分成小股扒在地下沟内不敢抬头。有个日军试探着往上爬，刚一抬头，就被子弹打中，当场毙命。另一个日军小头目，爬出掩体，躺在地下，用脚顶住帽子再一次试探，刚一把腿翘起，“砰”的一声，把鬼子的脚打伤了，他还逼着我把布鞋脱给他穿。国民党不放空枪，打打停停，把日军打的进退不得。天快晌午了，日本大部队来到，我随着他们撤到了塔湾。”下午，日军把大炮推进到距思故台很近的地方，地上大炮轰，空中飞机炸，把思故台阵

地夷为平地，在守军打退敌人几次冲锋后，才开始后撤。后来日本人曾一面宣称“南关南侧的沙丘阵地”如何坚固，抵抗如何顽强；一面又说“由片山准尉等7人发起了冲锋，并占领了该阵地。”实乃守军撤退之后而占领的。日军这样夸耀自己，不过是吹之乎也罢了。五郎庙：战斗打响后，日军在炮火掩护下，突破了二十九师五郎庙前哨阵地。守军且战且退，经过逐村、逐阵地阻击，9点30分，在英美烟草公司旧址与敌人展开了手榴弹战，一时形成胶着状态，遏制了日军的进攻。北祖庄：八十五团二营五连凭借寨垣有利形势，给进犯的日军以沉重打击。连长欧阳步腿部负伤仍不下火线，从早上一直打到中午，完成了支撑任务，撤回到城内主阵地。日军占领祖庄后，继续向南攻击，进入了二十九师设下的地雷群，伤亡很大，不得不停止进攻。塔湾：由八十五团六连守卫，当日军攻打南关战斗激烈时，该连连长李安唐，奉命除坚守自己阵地外，兼侧射南关之敌，有力地支援了南关守军，对日军攻城构成严重威胁，迫使敌人调转炮口猛攻塔湾六连阵地，并下决心攻占它。将近中午时分，日军不惜代价，强行攻打，至今塔身尚有当年日军炮击的痕迹，成为日军寇许的铁证。日军占领了塔湾后，用3门小钢炮向城内文昌阁射击，城内吃紧。下午1时许，团长杨尚武命令二连反攻塔湾，夺回阵地。连长吴超由三里桥率队向南猛攻，攻到罗庄，即与敌人展开枪战。敌人用炮还击。四班长王合义腹部中弹，肠子流出，用手握住仍继续战斗，并把机枪零件包交给副班长，叫他带领全班完成任务。三班长左庚辰，身上多处负伤，血流满地，仍向前冲击。连长吴超，赤脊梁，掂片刀，冲锋在前，与敌人打得难分难解。但由于敌人集中力量阻击，不断加强炮火，使二连反攻没有奏效。只是牵制了敌人兵力，减轻了城内的压力。

从城近郊的战斗中，使日本侵略军感到，许昌不是一举可以荡平的，新编二十九师也不是一触即溃，而是一块很硬的骨头，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后来日本防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所编写的《河南会战》一书中也承认，“北门方面枪炮攻击激烈，进展迟缓，估计正被牵制在北方”，“南门攻击的行动颇为迟缓”，“西门攻击队方面前进受阻。我方伤亡也在陆续增加。”直到30日中午，除外围据点被日军占领外，四关仍在守军掌握之中。日军对新编第二十九师的顽强抵抗感到吃惊，使原来攻击许昌的计划被打乱了，不得不继续增援部队，集中炮火攻击南门。下午，日军在仍无进展的情况下，17时，又出动12架九九式双引擎轰炸机，飞临许昌上空，在守军的阵地上猛轰烂炸。12门大炮也同时向西门外的房屋和城墙西南角集中轰击，战斗达到了最高潮。守军阵地被摧毁，经过一番苦战，撤到了城内，日军占领了西关、南关。此时双方暂停射击。精疲力尽的日军，一方面在清理战场，一方面作攻城的准备。守军也继续加固工事，准备迎头痛击日军。

在保卫南关、西关的战斗中，我军临危不惧，以血肉之躯冒死和敌人展开厮杀。营长何景明、胡光耀，都是身先士卒，打退敌人数次冲锋后壮烈牺牲，实现了他们与阵地共存亡的誓言。营长乔冠英和日军拼杀红了眼，在南关一桥下手持铡刀，连砍数人，真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6时许，日军的进攻又开始了。吕公良坐镇南门，亲自指挥战斗。守军抵抗更加顽强，连续挫败了敌人6次冲锋。双方伤亡惨重。吕公良命令八十七团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南门，并向南门增援了一个补充营。日军对于许昌是志在必得，亦不惜代价连番攻击。进犯西门的敌人，虽乘飞机轰炸、大炮轰击之机逼近了守军防地，但结果仍未能逾越雷

池。此时，日军组织了20多人的敢死队，冒着守军炮火，从城西南角跳进了城河，利用炮弹、炸弹的硝烟掩护，逼近了城下，赤身冲了过来，抢占了城墙边上的三间房屋。日本人在《河南会战》一书中说：“踏上了攻占许昌的第一步。”19时，敌人冲进了西门，但被阻击在那里，动弹不得。攻击南门的日军，18时20分，从城南郊高庄调来了4辆坦克，对我南门猛攻数次，10分钟后，将城门破坏，冲入城内。但日军步兵未敢随坦克跟进，只是在战车内藏有少量的兵力。坦克进城后，象只无头苍蝇，对四周进行了约1小时的攻击，根本无有什么目标。当为数不多的敌人从战车上下来后，守军猛冲上去与其展开白刃拼杀。20时许，敌军后续部队冲进南门，守军吃紧，一部分退了下来。团长李培芹正在师部（东大街商务会）向师长汇报南门战况，听到南门失守，火冒三丈，眼都红了。从商务会出来，站在东小十字街上，看到自己的部队由奎楼街向北退却，甩掉帽子，掏出左轮，对空连发数枪，二目圆睁，大声喊道：“给我顶住！”急速向南跑去，和战士一起打了一个反冲锋，然后和敌人展开了逐房逐屋地争夺。副师长黄永淮的侄子黄正道，是八十七团的一个连长、守南门，天黑前，从南门撤退到天平街，正碰上黄永淮督战，黄拔出手枪命令道：“坚决顶住，后退者枪毙！”黄正道又返回南门和敌人拼杀，战死在沙场上。坚守在东门外的八十五团与敌人交火后，打打停停，被敌人围困在三里桥一带。下午通讯中断，情况不明。天将黑，师部派传令兵杨学甫到八十五团送信，因敌人封锁没有成功，手腕中弹而回。夜22时左右，团长李培芹从南门回来向师长报告战况，劝师长出城，撤出阵地，并说：“战局实难扭转，部队打得这样惨烈，伤亡不断增加，又得不到补充，我们只有在这里等死。走吧师长，我保你一身无事。”